

博士思想文丛

踩空的踏板

程光炜 著

博士思想文丛

踩空的踏板

程光炜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踩空的踏板/程光炜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12

(博士思想文丛)

ISBN 7-222-03010-7

I. 踩... II. 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9307 号

责任编辑: 原金菊

封面设计: 鞠洪深

博士思想文丛

踩空的踏板

程光炜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 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10 千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222-03010-7/I·809 定价: 15.30 元

学问和思想

谢冕

这一套书的作者，都是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他们中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论起辈分，也算是我的学生。这点，我是有点占便宜了。不是我好为人师，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是老师，而且我的岁数比他们大，所以他们只能是学生。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我的学业有成的年轻的同行。所以，能够充当这套书的主编，在我不仅感到荣幸，而且很是亲切。

“文革”动乱结束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规。70年代末恢复高考，80年代初恢复学位制度。于是有了最早的一批我国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本丛书的作者，就是从那时开始在不同时段里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有志之士。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些都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这些作者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如今都已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了。我当然是很高兴的。

古今做学问的，大抵沿着两种路线走。一种人以史证见

长，他们博闻强记，谙熟典籍史料，对诸家学说有周到的了解和考研。他们有很强的综合能力，而且能够为前人补正甚至指谬。这大抵就是平常说的“我注六经”类。另一种人叫“发明见长”，他们思维敏捷，敢立论，重创新。这种人充满智慧，往往出语惊人，发前人所未发。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六经注我”类。对前一种人，我特别佩服他们锲而不舍的毅力和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对后一种人，我佩服他们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光华逼人的才气。

当然，最好是二者兼而有之，即既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又能够在事实基础上有创造性的发挥。但这种“全才”毕竟是很少的。就以后一种人来说，如若对“六经”毫无所知，那又用甚么来“注我”呢？所以，离开艰苦学习和积累的所谓“创造”，是非常靠不住的。我常感叹目下那些华而不实的风气之误人，应当看到，一些浮躁之风正在毒害我们那些急功近利的学界同人。因此，我以为，不管你倾向于何种做学问的路径，首先必须作好打基础的事。所谓“学问”，第一要义就是要“学”、要“问”，首先是要读“六经”，而后才谈得上“我注”或是“注我”。

本丛书的几位作者，他们从事的学科，大都集中在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些领域。因为均切近于实际的学问，其间虽也有考据或文献学方面的工作要做，但总的看来涉及的和可供发挥之处并不多。故他们的治学风格多趋向于智慧与文采的发扬。即使如此，他们的情况也有不同，有的严谨，有的洒脱，有的激烈，有的风趣，有的有时也难免有失之空疏的弊端。但总的看来，并没有传染上时下流行的那种令人生厌的浮华浅薄的风气。

这套书所收多近于学术随笔一类文字，太过专门的学术论文未予收录。这些作者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直面鲜活的

文化状态和文学潮流。他们把文学发展的动态，放置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他们的学术活动，其最鲜明的特点是对当代的人文状态的充分关切。这是这些青年学者最为感人的学术品质，他们的确无愧于培养他们的那些学校和学术机构。

做学问最忌的是不着边际的空泛，是虚无缥缈的高谈阔论。本丛书的作者的专业是文学，文学较之其他学科具有更多的审美性和精神取向，相对于生活的物质性方面显得是有点“漂浮”的。因此，对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始终保持和社会现实、文学现实的密切联系，对不断发展变革中的社会、文化、文学实际保持着精英意识的关怀和投入精神，是体现作为人文学者的胸襟、涵养和品质的最重要的条件。令人欣慰的是，本丛书的作者们的行事，大体上也都未背离上述这些条件。

本丛书的名称是“博士思想文丛”，我很欣赏这个名字。博士们是研究学问的，这个题目把学问和思想联系了起来，是很有见地的。做学问而缺乏思想，做的只是死学问。一个有作为的人文学者，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各个层面进行积极的思考是应有之义。说他们是以文为生还不够，极而言之，他们是以思考为生。思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建设性的思考必将化为积极的物质力量，从而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文学者是不应该与世隔绝的，他们的思考必须与社会兴衰、万家忧乐息息相关，并将这种投入和关怀转化为锐利的思想穿透力。

前些年有人呼吁作家的学者化，究竟多少人在响应、多少人在实行，究竟取得了甚么样的成果，都很难说。今天我还想再补充一条，这便是对学者的要求——他们应该同时是一位思想者。在这个平庸的年代，这种想法也许会招来窃笑，只好由

他去了。但当我面对着这一套充满人文关怀的著作，打开书页，为它那喷薄而出的锐利的思想力和批判精神所感动的顷刻间，使我对自己的这些想法顿然有了某种自信。

2000年3月11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作者简介

程光炜，男，1956年12月生，江西省婺源县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十五”社科基金文学评议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著作有《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艾青传》、《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雨中听枫》、《重返历史之地——中国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史》等。

博士思想文丛

后现代的间隙

陈晓明 著

踩空的踏板

程光炜 著

想像的盛宴

孟繁华 著

破镜与碎影

陶东风 著

无居随笔

旷新年 著

CONCEPT 设计工作室
装帧设计 鞠洪深

目 录

文化的遥望

一点感想，两个问题·····	(3)
如何更复杂地回到当代文学史中去·····	(6)
文化白领的历史寓意·····	(11)
新启蒙主义的本质化和扩大化·····	(14)
理想的陷阱·····	(19)
在愤怒与怀旧之间·····	(24)
可疑的叙事·····	(27)
感慨八九十年代·····	(31)
我的欧根·奥涅金情结 ·····	(34)
不妨是一个问题·····	(37)

镜像与现场

重读鲁迅日记·····	(43)
周作人评说八十年·····	(47)
鲁迅、周作人与五四·····	(67)
郭沫若的窘境·····	(74)

并非题外的话·····	(81)
反思臧克家·····	(88)
从女人的角度看丁玲·····	(93)
张允和与她家族的两本书·····	(96)
空荡荡的长廊·····	(102)

闲居忆往

朋友之歿·····	(109)
燕山苍茫·····	(112)
雪中小忆·····	(117)
绝望的体验·····	(120)
恢复高考二十年·····	(125)
谈旧·····	(130)
暗淡的记忆·····	(134)
访韩一瞥·····	(136)
清风明月下的东湖·····	(139)

读书、批评手记

女性的胜利·····	(145)
散文中的文化遗民·····	(153)
在故乡的神话坍塌之后·····	(168)
中国新诗在 1949 年前后的变动·····	(191)
找回一个权威·····	(211)
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	(224)
普希金《致大海》读后·····	(232)
何其芳的两首旧作·····	(237)

老水手的歌·····	(243)
《跨世纪青年诗选》序·····	(249)
愤然与幽默的文字·····	(256)
勾画梦的世界·····	(259)
是否还可以浪漫·····	(263)

文化的遥望

一点感想，两个问题

多事的二十世纪很快就要过去。听说有人已在准备“总结经验，迎接未来”的文章。说老实话，对新世纪的到来，我一点也不觉得兴奋。在《灯下漫笔》里，鲁迅曾表现过对“未来”的漠然，称它是“一种循环”，还说过“现在入了哪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之类的话。周作人后来也发表过人和时代都是“过渡的”看法。如此说，不是表示我们对新事物无动于衷，而是想试问：怎样“总结”，如何“迎接”？

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事件”的一百年。放在本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视野里看，“事件”意味着一种时间、发展的概念，因为每一个事件都可能会转移、破坏、推动或影响到这一进程的走向、面貌与结局；另一方面，它们也象征着若干个历史片断的存在，就像大海中的若干个“群岛”。尽管有诸多政治社会学的判断，但是人们在各个事件的刺激和演变中得到的只是“未来”的承诺，一个现代化方案，而非真正的实践；或是目睹了许多社会阶段的“更迭”，在先进的社会意识掩盖下的却是极旧的伦理实践。一种线性的历史认识和考察方法，致使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直不乏各种姿态的“作家”，然而始终缺少像鲁迅那样的“伟大书写者”。鲁迅把“辛亥革命及其失败”的现代喜剧搬上中国现代文学的舞台，并把民族

的集体记忆变成一个个不朽的文学形象，这些文本所达到的思想考察深度，丝毫不亚于托尔斯泰之于俄国农奴改革，雨果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艾略特之于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二次大战，帕斯捷尔纳克之于十月革命的“意义”……相反，鲁迅之后的“抗战”、“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市场化的九十年代”等在不同阶段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的大事件，始终没有真正走进中国作家的历史视野，抑或并没有人真正用“思想”来刻画它们，通过一部作品“留下一段历史”。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长期处于主流的政治文化对前者的切削、淡化、修改和再叙述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许是我更为关心的，是本世纪后半叶中国作家、评论家的“应对表现”。翻开文学史可以注意到，在1949—1984年的文学空间里，顺应潮流、体制的“颂歌”体、“战歌”体、悲歌与欢歌体，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流派和审美类型。在这一时段中，几乎没有“体制外”、“非公开”的“文人”创作，即所谓的“个人写作”。没有人真正敢于接受道义、良知和审美经验的严苛检验，那种没有前途和孤独自守的人生处境的“安排”。相反，思想界、学术界倒出现过像陈寅恪和顾准这样的历史人物。对这一段文学发展，我称其为对“事件”反应的“无意识期”和“精神休眠期”。九十年代初，伴随着社会市场化的兴起，文学创作和研究界掀起了“历史终结化”的热潮。在这场“解构革命神话”的戏剧中，事件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再次被“掩埋”，有时还变成叙述者的娱乐对象。在批评者笔下，则被解构成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一个个互不相干的历史“片断”。正像五四文学革命一样，九十年代的某些作家不单抛弃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而且还抛弃了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那份出于无知操作的“答卷调查”即为一例）。因此，可以想像，在一个没有诸多伟大事件“重叠”和“累积”（它实际已经是文

学母题的“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环境里，要想出现划时代的文学奇迹，是不可思议的。

于是人们会问：在世纪之交，文学家们要“总结”什么？又有什么可以“迎接”？

1999年11月13日